





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 
in 2009 with funding from  
Multicultural Canada;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



---

# 改造現狀的考慮

## ——考慮範圍的改造

曾澍基

九七問題，在既得利益集團營造之下，變成是收回或「維持現狀」的抉擇問題。這種簡單化自然有其意識形態的作用。實際上，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，始終要回歸到祖國的懷抱，無論從民族主義原則或實用的政治經濟考慮出發，這都是不爭的結論；從內部發展來說，香港的資本主義「現狀」從來就未停止過變化，以出口工業為主的經濟成長和被金融地產投機壟斷的「繁榮」就屬兩回事，民衆的社會意識水平、工會、「壓力團體」的活動，六〇年代和八十年代亦不能同日而語。「現狀」發展下去，經濟形態只會愈來愈扭曲，財富只會更加不均，羣衆的不滿對落伍的政治架構的衝擊將更形強烈；換言之，社會矛盾將迅速尖銳化，「現狀」也就無法維持，必須改變。

剛巧有這樣的歷史契機：由於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利，香港無必要立刻收回，一個過渡時期乃成為可能。這個過渡時期對中國和香港的民衆雙方都有好處，中國可以繼續利用香港賺取外匯，開展資本及技術引進，香港的民衆可有較多的時間適應，而不須一夜之間從「自由放任」的資本主義社會躍進社會主義社會之中，距離逐漸拉近，陣痛乃可減弱。但過渡時期之作爲過渡時期，意味了「現狀」必須不斷改



變，因為最後香港仍要溶入中國的政經文化體系裏去。

基於這些考慮，筆者認為過渡時期內香港的政經制度可作如下的安排：中國收回主權，英國退出，但管理權仍在港人手上，成立市議會，議席可民選和委任參雜，現存的國家機器（行政、警察、社會服務等等）可在改良之後繼續運用，經濟方面香港應「自負盈虧」，儲備及貨幣獨立，並加深民主化的介入，一般公共企業應更嚴格監管，部份可收作公營，金融地產投機必須壓抑，政府重新扶助工業，使之提高技術水平和擴大就業機會，改革稅制和實施較全面的社會保障計劃，必要時可運用彈性較大的「所得政策」，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平均……。一句話：在過渡時期內，香港應實行半民主的、改良了的資本主義制度。

這種制度和民主的、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制度——中國現正企圖邁向的目標距離是拉近了。隨着形勢的變化，民主和經濟「社會化」的程度可以加深，政治經濟制度亦可加強掛鉤，在初期則不必過於急燥。

這種制度是有實現的基礎的。通過市議會的部份委任，中國將維持一定的政治影響力，開始時甚至可以委任議員佔大多數；經濟方面，這種改良式的資本主義模式在世界上比比皆是，遠至瑞典、法國（戴斯亭的法國，不是社會黨的法國），近如日本、新加坡，都是程度不同的代表，很多資產階級都在恐嚇，改變現狀會使資本大量流走，這是唯心之言。利潤機會永遠是相對的，連實施「社會主義」制度的國家如中國、波蘭，國際資本都趨之若鶩，筆者就看不出中國主權下的改良資本主義特區會如何失去「大量」的吸引力；自然，本地及東南亞的投機資本可能沒有了用武之地，但它們對香港經濟的健康成長和中國的現代化有過甚麼貢獻呢？趁過渡時期的開展清除一下流毒也未嘗不是好事。另一方面，這種制度亦比較符合民衆和勞工階層的利益，矛盾雖然不能徹底解決，起碼也可以和緩一下。這是中國方面應該樂而爲之的事。

「維持現狀」的觀點，不過是把真正的問題加以迴避，拖延時日，而且還有拉遠香港和中國的距離，因而加強回歸陣痛的危險。如果



認為「拖延時日」只是一個策略，有利香港內部的更變，向中國的過渡和最終的溶合，這當然和既得利益集團的「維持現狀」論調有所分別，筆者倒願意接受指教。

原載於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財經日報《三分集》專欄

---

# 曾澍基談香港前途

問：曾澍基先生剛從英國返港，可否談談英國方面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看法？

曾：英國的輿論界對香港前途問題很少討論。保守黨政府的前外相卡靈頓曾經向中國外長黃華交換過意見，從某種跡象可以看出中英雙方都好像正在進行協商；但輿論所知的關於這個協商實在很少。工黨最近才設立一個有關香港的特別委員會，到1983年，工黨才可製訂一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政策。就我而言，因為我在英國所接觸的面很窄，在輿論方面看不出有什無特別資料。

現居倫敦的「香港研究計劃」秘書，華特·伊斯（Walter Easey）曾在英國《衛報》寫了一篇文章，說英國與阿根廷因福島的主權問題不能取得協議而開戰，原因是由於中英對香港前途問題也未取得一個協議，因英國對於福克蘭政策的決議，應與對香港未來的政策一致，原則貫徹，在外交上也應貫徹。這是一種看法。

的確，福克蘭危機之後，令英國人更注視剩下來的殖民地應



該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呢？我想，在福克蘭危機之前，有很多人是  
不知英國尚有十多個殖民地，而其中三個是有其他國家與英國爭  
議宗主權的——即福克蘭羣島、直布羅陀和香港。福克蘭事件之  
後，英國人對這方面的注視正大大增強。

## 不平等條約爲英治港法律基礎

問：英國政府對租約問題所持的態度是怎樣呢？中國方面又如何呢？  
他們之間是否存在着一個矛盾？

會：我想大家都會記得：1972年聯合國的殖民地委員會曾經徵詢中英  
雙方應否把香港列入殖民地的名單內，黃華當時表示中國的立場  
是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，香港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，在適當的時  
候會用適當的方法解決。因此將香港在殖民地的名單中刪除出來  
，但英國的反應是保留態度，英國政府後來表示是次在聯合國刪  
除名單並沒有影響香港的法定地位。香港的高層官員始終認爲他  
們統治香港的立法基礎是那三條不平等條約，但他們却並不與中  
國爭論此等條約是否合法。因此，在兩種不同看待香港租約的角  
度下，如何將雙方的立場拉近是此次談判的核心。

## 權益是否獲保障決定資本去留

問：對中、英雙方來說，維持香港繁榮可說是一致的見解。但對香港  
的投資者來說，他們需要一些長時間的保證，甚至是超過15年的  
保證。他們是否真的需要一個長期的保證才可以放心投資呢？

會：我對此問題有些不同的看法。恆生指數的下跌是反映短期投機者  
的信心，還是長期投資者的信心？

我們假設中國會收回主權，而管理權仍可留在香港人手裏。  
立法局現在的議員很多是香港人，我們可想像「港人治港」，香  
港仍實行資本主義結構，制度加以改良，政府加強介入經濟，糾  
正畸型現象，向工業提供援助，改善貧富不均等現象。究竟在此



情況下資金會否大量流失？一部份的看法是會，但我個人則認為：肯定有些資本是會退出香港，但卻不會大量流失。究竟會走去了那些資本？多數是東南亞投機的所謂「熱錢」、本地的投機資本等。但這些資本實際對香港有過什麼作用？或將有那些正面的貢獻？這個我很懷疑，反而，這些資本走了的話，可能對香港經濟結構是一件好事。

我們可以見到在中國投資的香港資本和外資都很多，可謂排隊到中國商議投資。在一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底下，外國國際資本到中國投資尚且具有信心，在東歐羅馬尼亞、波蘭等一樣有很多國際資本。我們要留意的是，資本的利潤機會永遠是相對的，在整個世界經濟衰退中，國際資本有何出路，香港相對於其他的投資地區究竟有什麼有利的地方？我們用比較的角度才有意義。

因此我覺得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，而經濟上香港仍可自主，實施改良資本主義體制，這是一個可行的方法。資本本身對主權誰屬不會感到興趣，問題只在於能否繼續保障其權益。中共一直叫投資者放心，就算收回香港主權，仍會保障香港的投資者。故我覺得這個政策是可行的，但問題最好從實際出發研究。香港的制度一直都很特殊，歷史上有創新，故這個方法却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
## 非殖民地化歷史潮流難以改變

曾：中英商討香港問題時應可討論英國在香港的資本。在香港的英資集團投在大陸的投資也不少，他們的着眼點不單單是香港，如能與中國作些恰當安排，令他們能繼續保護他們在香港的投資，甚或又可在大陸繼續投資及發展，英國不一定要在政治上控制香港。英國放棄主權與管理權，但這個只是討價還價，她可獲得多少利益。要知道英國遲早也總是要走的，就算延長30年，30年後又如何？

對英國來說，非殖民地化是一個難以改變的潮流；對中國來說，若要維持香港的現狀，究竟又能夠維持到幾時？香港始終是



中國的領土，遲早要重歸中國；我覺得現在中共主權下的資本主義特區可作為一個過渡時期的形式，使香港從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一個社會主義制度。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可加深社會化，逐漸與中國接近。如果這樣看，香港的前途問題並非是拖多久的問題，而是怎樣使香港過渡到中國的體制裏的問題。

中國不能一下子收回香港，香港亦不能一夜之間由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，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慢慢開始過渡，雙方都能夠獲益，也能幫助四個現代化。這樣的安排，可吸引資本集團肯繼續參與香港的投資。資本集團只求利潤，中國作了妥善安排，而英國覺得他們在港利益受到保護，而在中國投資發展是有一定前途的話，我覺得一個過渡體制的可能是不能抹煞的。

## 中國統治的改良資本主義特區

會：自從彭真的講話之後，已經進入過渡體制的細節思考階段，如貨幣會怎樣、法律怎樣，這些雖然是技術性的問題，但亦必須解決。在過渡時期，香港是在中國主權下的一個改良了的資本主義特區，所以經濟運作的原則依然是資本主義，如私有產權應該維護，而改良的意思是在福利制度方面。財富較為均分，經濟方面改正現在過分著重金融地產，政府介入去援助實業性的工業發展，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。

至於貨幣方面，在這個過渡時期，香港仍是出口業佔主導的階段。由於人民幣本身在國際上的通行性仍有一定程度的限制，所以香港的貨幣依然需要獨立。至於什麼人發行貨幣，這個並不重要，可以由滙豐繼續發行，或者成立一個貨幣局由它的名義指示滙豐發行，甚至成立香港的中央銀行，由它來處理。

如果要保持獨立的貨幣，香港的儲備應該獨立計算，自負盈虧。特別是中國發展她本身的貿易，人民幣的通行性增廣之後，可以通過港幣與人民幣的一個比較合理的掛鈎，然後最終來一個貨幣的統一。技術的細則可以商榷，但我看不見有什麼不可克服的困難存在。



問：香港政府去年推出的地方行政模式，讓民衆參與選舉，這是否邁向自治的模式？

鄭\*：從英國對待星加坡及馬來西亞等殖民地的經驗中，可見星加坡與馬來西亞的模式是：起初有立法議會，立法議會裏面的總督是英國人委任的。而議員也是委任的多，選出的少。選出來的也不是全民選舉。後來推選地方政府，最後發展到全民選舉。我相信中共應該接受這點的，因為這不是走向獨立，而是自治，這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方式。

在英國來說，這是一個可行的辦法，因為已經應用在其他殖民地，不必再在國會爭論。如果用一個新的模式，還有應用到全世界的殖民地問題，會引起嚴重的爭議。

我所指的自治，是在中國主權下的自治，自治包括政府、土地、人民，最主要的是政府，土地是屬於中國的，而政府是中國賦予權力的。

馬來西亞獨立的時候，是英國人接受得來的，在經濟方面，英國的經濟利益不單沒有妨礙，還增加了，75%的企業是英國人管理的。

會：我未必完全同意鄭博士所說自治模式，英國人如果退出，一個比較乾淨利落的方法是完全退出，管理權基本上是放棄的，軍隊都退出，這才算是港人治港。自治的形式最主要的，但是這始終是個過渡期，必須不斷拉近香港與中國的關係，時間、速度也要看實際的情況考慮。

我不會理想化地要香港的統治架構完全是香港民選出來，可能的方式是市議會，議員全都是香港人，但中國可保留委任部份議員的權利，保持一定的影響力，對外關係、軍事外交，一部份劃給中國，對特區經濟運作必須給香港打理。而政治權力是有一定移交的。

問：在我們談及香港的未來模式是怎樣的時候，我們考慮中英雙方或

---

註：鄭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行政系講師鄭赤琰



投資者的關係和利益，但是第三方面，如民衆的權益、社會福利、自由的保證等又怎樣看待和改善呢？

會：有一個原則很重要，需要強調，當我們考慮這個過渡時期的體制，應該用這個機會，改善香港整個社會制度，經濟制度，加強福利，改變不正常的發展途徑，法律、民主的代表性。一考慮種種可行的方案同時，又須考慮其合理性。

原載於一九八二年八月號廣角鏡



